



# 城市青年的代际支持：观念与行为

□ 邓 蕾

**摘 要** 本研究通过使用 2015 年“中国都市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数据，以“奉养观念”和“孝道观念”为主要切入点，检视了城市青年代际观念的内涵和结构，并考察其向中老年亲代提供不同的代际支持时的观念选择和整合逻辑。研究发现，建立在破除亲子等级权威、强调个体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家庭主义价值观正在为大多数青年所共享。以义务为本位的同住奉养观念和子女养老观念会明显促进子代向亲代提供结构性、情感性、功能性、联系性支持，而以自然情感、代际对等为要义的“相互性孝道”对情感性支持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关键词：**代际观念；代际支持；城市青年

##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思路

代际支持不仅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更是一种靠文化维系的行为。代际观念等因素在讨论中国的代际支持时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一方面，正是以奉养、孝道为核心的文化期望与实践构成了中西方代际关系的最大差别<sup>[1]</sup>；另一方面，在关于中国代际关系模式的延续抑或变迁的讨论中，学者们常常不约而同地将其归因于代际观念的嬗变。但是，文化观念到底是如何作用于代际支持行为的，既有文献通常语焉不详。本研究致力于描述和比较城市青年在代际关系中可得的文化观念及其结构性特点，并试图分析和归纳子代在提供不同的代际支持时，在多元的代际观念之间进行选择的逻辑和组合的方式。

### 1. 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代际支持观念与行为

关于观念在形塑个体行为时扮演的角色，在文化社会学中，有两种研究传统：第一个传统核心论点在于将价值观等视为社会共享的象征体系，文化通过为行动者提供以之为取向的观念来影响人的行为<sup>[2]</sup>，代表人物有韦伯、帕森斯等；第二个传统来自于斯维德勒（A.Swidler），在该分析框架下，文化是异质性、碎片化和竞争性的，文化价值不是通过影响个体的目的选择，而是通过形塑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可以从建构行动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的文化资源或价值类型（value type）来发挥作用<sup>[3]</sup>。

将观念视为行为之目的的研究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着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主流位置。帕森斯等认为，个体主要通过社会化获得观念，并假设最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发生在青少年阶段；观念一旦被内化，就会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保持稳定<sup>[4]</sup>。在该传统的指引下,研究者往往把观念与行为看成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sup>[5]</sup>,观念-行动研究的重点即是理解外在行为和内在文化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把特定的行为模式对于从事这些行为的人而言何以合理诠释清楚了,也就揭示了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做而不那样做<sup>[6]</sup>;换句话说,个体对特定观念的持有程度成了推测其特定行为的重要指标。这一研究传统的局限性在于——对文化多元性和行动者能动性的无感。

与强调文化价值的趋同性和先验性不同,将文化视为行动工具箱的研究传统认为,个体所经历的文化是异质性和竞争性的,构成行动者工具箱的那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文化资源内部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即文化价值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被社会性地加以竞争的<sup>[7]</sup>。同时,处于特定文化中的行动者在接受共享的价值体系后也并不能保证相似行为的产生,而是会根据不同的情景以不同方式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选择 and 整合,并根据他们的行动策略来评价行动目的,而非相反<sup>[8]</sup>。这一研究视角和路径正逐渐成为当前观念-行动研究的主流。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具箱视角几乎否定了处于特定文化中的个体行动可能具有的模式,这等于终结了从文化的角度捕捉某种行为模式的可能性<sup>[9]</sup>;另外,这一视角下的文化概念要在量化研究中概念化、操作化也相当有难度<sup>[10]</sup>。

对两种文化理解传统的比较给我们的代际观念-代际支持研究带来的启发是:

首先,既要充分肯定行动的文化多元性、策略性又不能忽视行为所具有的最低限度的一致性。行动者的能动性既不能否定也不能过分强调,同样,结构本身既是动态的又能维持必要的稳定性<sup>[11]</sup>。

其次,观念-行动研究需要立足于个体对观念的内化程度及对行动的影响<sup>[12]</sup>,但又要警惕简单地将观念视为对行动者的目的选择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或潜在变量,而应该注意考察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可得的文化价值资源及其选择和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sup>[13]</sup>。

国内学者在做代际关系研究时,大多沿着将观念视为行为之目的的研究传统进行,但常常难以解释为什么子代在有些情境下强调孝道话语,却在其他情境下强调理性交换。事实上,研究者更需要关心的不是在某一时间点上代际观念是传统的或者现代的,而是个体可得的文化资源及其特点是什么,以及他们在特定情境中实施不同的代际支持行为时,是如何在多元代际观念之间进行评价和整合的。

## 2. 代际观念的核心内容

代际观念是一个多维体系。既有研究将奉养观念和孝道观念作为主要切入点,对转型期代际支持观念的内涵和结构进行了检视。

### (1) 奉养观念

关于奉养观念,一般沿着居住安排和经济奉养等两方面进行考察。

传统上,与已婚儿子同住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安排方式<sup>[14]</sup>,代际同住模式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对以父系为主轴、以父母为中心的强调。自改革开放以来,“婚后与亲代分开居住,但不要离得太远”的观念逐渐成为大多数子代的置业理想<sup>[15]</sup>。但也有人指出,城市中的老人是倾向于独立生活的,反倒是成年子女更重视和老年父母共住的训诫<sup>[16]</sup>;同住奉养观对子代的约束力在亲代生活难以自理、需要照料时会得到更清晰的体现<sup>[17]</sup>。

经济奉养是子代对亲代提供功能性支持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子代要分担老年父母的生活费,即使是在外务工期间也要给父母寄钱等观念普遍存在于年轻人中<sup>[18]</sup>。不过,也有学者通过质性研究发现,年轻一代已不再将报答养育之恩看得那么神圣,转而强调亲代对子代的社会责任,认为和其他形式的报答一样,必须不断地有来有往、才能维持代际的支持行为,且父母养老生活费不依靠子女在观念上也是合理的<sup>[19]</sup>。

可见,在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奉养观念的内涵既富有强调家庭主义、义务本位的面向,也包括肯定个体主义、权利本位的面向。前者主张维护和促进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价值体系,互以对方为重、优先考虑对方的需要、奉行利他精神;后者将子代的需求、主张正当化,强调家庭成员各自的独立性和平等关系,认为代际支持的驱动力是相互情感而非家庭责任。基于此,本研究在概念化和操作化奉养观念时将同时兼顾“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等来构建指标。

### (2) 孝道观念

孝道作为华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核心观念,始终备受瞩目。周晓虹认为孝道观念中同时包含着“孝”和“顺”两个基本维度,前者的基础是亲密情感、代际沟通和对等关系,后者强调的是辈分尊严,即子女对父母的无条件遵从<sup>[20]</sup>。台湾学者叶光辉等人所提出的孝道二元模型认为,孝道观念含有“权威性”和“相互性”两个面向,其中,权威性孝道的运作基础是“父母-子女”这一家庭角色对偶组构成的等级关系,“相互性孝道”运作基础是源自于亲子间亲密的关系联结与自发的情感表现<sup>[21]</sup>。

孝道的两个基本维度在运作特征上虽然有所区隔,但彼此并非对立互斥,也不是分属于不同时代的文化产物;这两类孝道面向所反映的代际的对等关系和等级关系,无论在传统或现代社会中皆同时存在<sup>[22]</sup>。外在社会环境的改变并不表现为特定孝道向度的存废,而是显现在双元面向在当时社会相对比重的变化,至于哪个面向更受重视并无既定或单向的转型路径,而是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社会主流趋势与哪个孝道面向较为契合<sup>[23]</sup>。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仅以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而既有研究大多指出代际观念存在乡-城差异。

### 3. 代际支持行为的多元维度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代际支持行为。国内学者曾将代际支持行为类型化为家务支持、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等。国外研究近年来以本特森(V.L.Bengtson)等创建的代际团结模型为最普遍的理论架构<sup>[24]</sup>。代际团结模型包含了6个不同的团结维度,分别是合意性团结、规范性团结和结构性团结、交往性团结、情感性团结、功能性团结<sup>[25]</sup>。结构性团结是一个限制或增强家庭成员之间互动的机会维度,通常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地理距离,在相关研究中多使用“代际同住”来测量;交往性团结是指家庭成员参与各类活动的频率和模式;情感性团结是指对家庭成员所持有的积极情感、程度以及对这些情感的相互性体验;功能性团结是指帮助和资源交换的程度,通常使用代际相互帮助(如经济上、身体上、情感上)的频率和代际资源交换中的互惠性评分来测量;合意性团结是指家庭成员在价值观、态度和信仰上的一致性程度;规范性团结是指执行家庭角色、承担家庭责任和履行家庭义务的承诺强度<sup>[26]</sup>。不同维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转化,相互交织、共同决定着代际关系的整体结构和类型。本特森等强调,在代际关系中,团结和冲突是并存的,因而,代际团结模型既要测量代际的凝聚力,也要反映代际冲突和矛盾情感<sup>[27]</sup>。

引入该模型来分析转型期中国城市的代际关系是适宜的:首先,代际团结模型能够对代际的交换、照料、联系、互动、亲密等进行多重关照,有利于捕捉代际关系的复杂性及本质;其次,该模型生成的测量工具已多次成功地运用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之中,且还在不断地发展修正<sup>[28]</sup>,这可以弥补国内代际支持研究缺少系统分析和有效测量等问题。不过,对于中国而言,孝道、奉养等文化观念不仅是代际团结的核心要素,更是代际互动的标准<sup>[29]</sup>,因此,本研究将代际观念从

代际团结模型中抽取出来,考察年轻子代在向亲代提供结构性支持、联系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和功能性支持时的文化选择和组织逻辑。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于2015年开展的“中国都市青少年发展状况调查”。资料的收集采用配额抽样和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调查涉及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重庆、西安、昆明、哈尔滨、沈阳10个城市,样本包括2000个年龄在16~35周岁的非在校青年。由于研究关注的是成年子代尚且年轻、亲代尚未进入高龄时的代际关系,因此分析时仅挑选出父母任意一方尚且健在的个案,最终获得1640个有效样本。其中,平均年龄27.26岁(标准差为3.985岁),已组建家庭的为44.3%。

主要研究变量的测量方式如下——

1. 代际观念基于文献分析,本研究采用9个陈述性问题,4道题目测量奉养观念。其中,义务本位奉养观由“结婚后和父母/公婆住在一起”“父母年老后的生活费应由子女分担”等测量;权利本位奉养观由“结婚后就不该和父母/公婆住在一起了”“养老费用主要应由父母自己负责”等测量。孝道观念由6道题目测量,包括“做些让父母感到光彩的事情”“对父母养育之恩心存感激”等(详见表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孝道观念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使用正交旋转法对初始因子负荷做旋转后,得到了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的双因子结果,共解释原始数据57.13%的方差,其中,因子1涉及的是抑己顺亲、光耀门楣、延续香火等变量,参考叶光辉等人的分析将其命名为权威性孝道;因子2涉及的是感激父母、善待父母、让父母生活舒适等变量,命名为相互性孝道。基于因子分析结果,我们计算出了每一个被研究对象在两个公因子上的得分,用于分析和不同代际支持行为的关系。

2. 代际支持行为本研究把结构性支持操作化为居住安排,其中,子代和亲代同住=1,不同住=0。联系性支持,操作化为亲代与子代的联系频率,纳入模型时将其二分类为“高”(每天、一周1次、一周几次、一月几次、一月1次)和“低”(一年几次、一年1次、从不联系),其中,联系频率高=1,低=0。情感性支持,操作化为亲代和子代间相互听心事或了解想法等,在问卷中我们询问了子代在过去6个月中得到情感性支持和给予情感性支持的程度,纳入模型时将其二分类

为“多”（“经常”、“有时”）和“少”（“很少”、“完全没有”），其中，情感性支持多=1，少=0。功能性支持，用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双向经济帮助和家务料理来测量。经济帮助指在调查前12个月里子代从亲代处获得和给予亲代的钱、食品或礼品等情况；劳务支持指子代从亲代处获得以及提供给亲代的日常照料等的频率。纳入模型时均将其二分类为了“多”（“经常”、“有时”）和“少”（“很少”、“完全没有”），其中，功能性支持多=1，少=0。

3. 控制变量拟合统计模型时引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如下7项：性别，为虚拟变量，女性=0，男性=1（所占比例为50.2%）。年龄，以“调查执行年度”减去“受访者出生年度”计算而得，为连续变量。年龄平方，年龄变量自乘，以检验年龄与因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均值为758.90，标准差为218.306）。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未婚=0，已婚=1。是否独生子女，为虚拟变量，独生子女=0，非独生子女=1（45.6%）。亲代年龄，目的是创设随着父母年龄增长而可能带来的不同的需要情境（如健康状况的变化等），测量过程为若父母均健在，则使用年龄较长者的年龄，若父母已经丧偶，则使用健在者年龄，并将其划分为三个群体——49岁以下（壮年亲代，比例为23.5%），50~59岁（中年亲代，比例为56.3%），60岁以上（老年亲代，比例为20.2%），以符合对代际交换阶段做研究的需要。亲代户籍，通过父母的户籍所在地来测量父母的养老社会保障条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亲代的户籍是农村还是城市，意味着亲代从公共福利中摄取的养老资源的不同，测量过程为当父母均健在时，若有城市户籍的，取持城市户籍的父母的值，若父母已经丧偶，则取健在者户籍的值，其中，城市=0，农村=1（比例为45.1%）。

就孝道观念而言，“照顾父母使他们生活舒适”、“无论如何都应该善待父母”和“对父母养育之恩心存感激”的规范在所有观念得分均值中排首位、第三位和第四位，可见，尽管社会经历了巨变，但对于大多数城市青年而言，父母养育之恩依然是至高无上的。不过，当代年轻人的孝道观念更多基于的是代际长期互动所累积的自然情感及亲密关系，而非源自于子代以遵从社会角色规范来满足父母要求或期待的传统，因而，抑己顺亲、光耀门楣、延续香火等孝道观念得分均值都比较低。换句话说，孝道在城市青年这里并未衰落，但是相互性孝道已超过权威性孝道成为年轻人孝道观念的核心，他们可能不在意是否顺从父母的观点或意见，但却重视在态度上或情感上对父母尊敬或孝敬。

表1：关于城市青年代际支持观念的描述统计

	平均值	标准差
FS1 结婚后和父母/公婆住在一起	3.02	1.027
PS1 结婚后就不该和父母/公婆住在一起了	3.19	1.065
FS2 父母年老后的生活费应由子女分担	4.10	.901
PS2 养老费用主要应由父母自己负责	2.25	1.170
AFP1 为了传宗接代，至少要生1个儿子	2.46	1.153
AFP2 放弃个人志向达成父母心愿	2.67	.995
AFP3 做些让父母感到光彩的事情	2.82	1.171
RFP1 对父母养育之恩心存感激	3.44	.973
RFP2 无论如何都应该善待父母	3.70	1.045
RFP3 照顾父母使他们生活舒适	4.16	.850

注：FS为义务本位奉养观，PS为权利本位奉养观，AFP为权威性孝道，RFP为相互性孝道。

### 三、研究结果

#### 1. 对城市青年代际支持观念和行为的描述统计

代际支持观念测量指标得分平均数与标准差如表1所示。就奉养观念而言，城市青年中有39.8%的人倾向于婚后不与亲代同住，比倾向于同住的人高了7个百分点。青年子代对“父母年老后的生活费应由子女分担”的认同程度大大超过了“养老费用主要应由父母自己负责”的观念，且后者在所有代际支持观念得分均值中排名最末。说明，与随侍在侧的同住奉养观相比，在物质或金钱上“养亲”的观念更被城市青年视为必须遵循的文化规范。

从子代向亲代提供的支持行为中我们可以发现，情感性支持已明显成为青年提供代际支持时最为主要的内容，其次是联系性支持，劳务支持、经济帮助等功能性支持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共同居住等结构性支持最低（详见表2）。全国范围内与亲代同住的城市青年不到4成，但是，亲子之间一个月至少见面1次的超过6成。代际在情感方面的亲密度很高，无论是子代付出的还是获得的情感性支持都接近8成。年轻子代大多在经济上、生活上和亲代保持着密切联系，提供经济或劳务支持的均超过半数，但低于从父母处获得的功能性支持，其中，子代更倾向于提供劳务支持，而亲代更多的是经济支持。在这一多维而复杂的

代际支持过程中,年轻子代普遍扮演着情感维度上的“互惠者”、功能维度上的“获得者”角色。城市青年与亲代的关系在整体上呈现出情感上紧密、功能上黏着、联系上较为频繁、结构上分离的特点。

表 2:城市青年代际支持行为描述统计(%)

	百分比
结构性支持(同住=1)	35.4
联系性支持(高=1)	63.0
情感性支持(高=1)	
得到的情感支持	77.7
提供的情感支持	77.6
功能性支持(多=1)	
得到的经济支持	74.0
提供的经济支持	56.9
得到的劳务支持	70.6
提供的劳务支持	59.6

## 2. 不同代际观念下城市青年提供的多样化代际支持行为

研究试图从青年子代出发,厘清其提供不同的代

际支持行为时、在不同的代际观念之间进行选择和组织逻辑、特点。表 3 报告了估计子代支持行为的二项 Logistic 模型结果。

从结构性支持模型可以发现,子代与亲代同住的行为同时受到同住奉养观念和权威性孝道的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协变量的情况下,同住奉养观每增加一个单位,年轻子代与亲代同住的发生比会增加 27.6%;权威性孝道每增加一个单位,子代与亲代同住的发生比会增加 14.3%;相互性孝道的系数为负,但是不显著。

从联系性支持模型中可以发现,子代与亲代保持较为频繁联系的同时受到奉养观念和相互性孝道的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协变量的情况下,“父母年老后的生活费应由子女分担”(简称“子女养老”)的经济奉养观念每增加一个单位,联系性支持的发生比会增加 18.8%。不过,相互性孝道每增加一个单位,联系性支持的发生比反而会减少 17.8%;另外,不同住奉养观每增加一个单位,联系性支持的发生比会减少 12.7%。“养老费用主要应由老人自己负责”(简称“老人养老”)的奉养观每增加一个单位,该发生比会减少 15.6%。

表 3:城市青年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模型:二项 Logistic 模型

	结构性支持	联系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	功能性支持 1 (经济支持)	功能性支持 2 (劳务支持)
同住奉养					
婚后同住	0.244*** (0.063)	-0.084 (0.061)	0.204** (0.072)	0.348*** (0.060)	0.342*** (0.060)
婚后不同住	0.097 (0.059)	-0.135* (0.058)	0.042 (0.066)	-0.047 (0.056)	-0.019 (0.056)
经济奉养					
子女分担养老费	-0.024 (0.076)	0.172* (0.076)	0.240** (0.083)	-0.040 (0.075)	0.131 (0.074)
亲代自担养老费	0.067 (0.060)	-0.170** (0.061)	-0.041 (0.069)	0.261*** (0.061)	0.183** (0.061)
孝道观念					
权威性孝道	0.133# (0.069)	0.080 (0.068)	-0.193* (0.079)	0.063 (0.066)	-0.047 (0.066)
相互性孝道	-0.042 (0.070)	-0.195** (0.070)	0.210** (0.078)	-0.114# (0.068)	0.008 (0.067)
性别(男性=1)	-0.042 (0.114)	0.058 (0.114)	-0.478*** (0.130)	-0.192# (0.111)	-0.327** (0.110)
年龄	0.024 (0.175)	0.127 (0.175)	0.059 (0.201)	-0.158 (0.172)	0.078 (0.170)
年龄平方	-0.001 (0.003)	-0.003 (0.003)	-0.001 (0.004)	0.003 (0.003)	-0.002 (0.003)



续表

	结构性支持	联系性支持	情感性支持	功能性支持 1 (经济支持)	功能性支持 2 (劳务支持)
婚姻状况 (已婚=1)	-0.419** (0.134)	0.435** (0.136)	-0.090 (0.151)	-0.056 (0.130)	-0.317* (0.128)
个人年收入对数	0.011 (0.068)	-0.020 (0.068)	-0.007 (0.077)	0.045 (0.069)	-0.056 (0.066)
是否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1)	-0.523*** (0.130)	-0.670*** (0.128)	-0.310* (0.146)	0.311* (0.127)	-0.004 (0.125)
亲代户籍 (农村=1)	-0.369** (0.132)	-0.666*** (0.128)	-0.127 (0.148)	0.291* (0.128)	-0.016 (0.127)
亲代年龄 (中年亲代=0)					
壮年亲代	0.123 (0.154)	-0.460** (0.155)	-0.022 (0.177)	0.313* (0.155)	0.092 (0.155)
老年亲代	0.409* (0.169)	0.290 <sup>#</sup> (0.169)	0.360 (0.192)	0.244 (0.161)	-0.068 (0.157)
常数项	-0.866 (2.416)	0.306 (2.438)	-0.382 (2.804)	0.483 (2.401)	-1.984 (2.383)
Log Likelihood	-927.57	-925.88	-768.87	-968.18	-983.78
模型 X <sup>2</sup>	127.39***	161.62***	87.14***	152.39***	92.21***
有效样本量	1640	1640	1640	1640	1640

注:(1) #&lt;0.10, \*p&lt;0.05, \*\*p&lt;0.01, \*\*\*p&lt;0.001

从情感性支持模型可以发现,子代对亲代的情感付出同时受到同住奉养观念、经济奉养观念和孝道观念的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协变量的情况下,同住奉养观每增加一个单位,子代提供情感性支持会增加22.6%;“子女养老”的经济奉养观念每增加一个单位,情感性支持会增加27.2%;相互性孝道每增加一个单位,则会增加23.4%;不过,权威性孝道每增加一个单位,子代与亲代同住的发生比会减少17.6%。

从经济帮助模型中可以发现,子代对亲代的经济帮助同时受到同住奉养观念、经济奉养观念和相互性孝道的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协变量的情况下,同住奉养观每增加一个单位,子代提供经济帮助的发生比会增加41.6%;“老人养老”的经济奉养观念每增加一个单位,该发生比增加29.9%;不过,相互性孝道每增加一个单位,子代与亲代同住的发生比会减少10.8%,权威性孝道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

从劳务支持模型中可以发现,子代提供给亲代的劳务支持同时受到同住奉养观念、经济奉养观念的显著影响,孝道观念的影响则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协变量的情况下,同住奉养观每增加一个单位,子代提供劳务支持的发生比会增加40.8%;“亲代自担养老费”的经济奉养观念每增加一个单位,该发生比增加20%。

## 四、总结与讨论

### 1. 代际观念的双元面向

本研究在对城市青年的代际观念进行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家庭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了解了青年对代际关系以及对子女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理解。

从青年的代际观念来看,养亲、善事父母等文化观念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在城市青年中依然赢得了很大的认同,虽然不少青年倾向于婚后不与父母同住,但奉养父母在当下青年群体中依然具有高尚的道德地位。孝道在城市青年这里并未衰落,不过,相互性孝道已经超越了权威性孝道,构成了青年孝道观念中的核心成分。如果我们可以将代际观念扼要地理解为由奉养观念和孝道观念组成的工具箱的话,那么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强调代际的利他精神、相互义务的奉养观和强调亲子间的平等关系、自然情感的孝道观,同时为当代青年所重视。正在为大多数青年所共享的观念是一种建立在破除亲子等级权威、强调个体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家庭主义价值观。

城市青年代际支持观念的内容结构变迁和转型期社会的两股发展趋势相关。首先,社会转型加速触动

了普遍意义上的个体崛起。国家之外的市场空间、社会空间的出现和蓬勃发展,让青年在体制之外谋求生活的可能性加强、社会流动性提高,表达意见、自我组织、社会参与的舞台扩展<sup>[30]</sup>。更重要的是,进入互联网社会后,由无限可能的互联、更低成本的链接引发的文化变革解构并再造着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为年轻人挣脱国家与社会的夹缝、世俗化成长、自主性选择提供了契机<sup>[31]</sup>。个体的权利和平等意识普遍增强,情感、能动性和自主选择受到强调,“为自己而活”、“对得起自己”普遍成为做人的新标准<sup>[32]</sup>。在此影响下,代际互动的本质由“强调角色阶序的伦常关系”转型为“强调双方平等且仅以彼此情感为基础的纯粹关系”,代际观念的核心从“对父母权威的服从”逐渐转化为“亲子间生活情感的展现”<sup>[33]</sup>。

与此同时,社会政策的家庭化趋势却又将个体—家庭紧紧捆绑在了一起。近代以来,传统家庭制度历经了多种形式的“去家庭化”改造<sup>[34]</sup>,然而,随着城市单位制和农村集体化的解体,家庭在满足个人需求、促进发展、福利保障乃至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被重新强化<sup>[35]</sup>。代际的相互支持再次成为不同家庭成员应对外部风险和适应社会剧烈变迁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前提<sup>[36]</sup>。虽然,中国的家庭规模在变小、结构在简化(夫妇户和夫妇—子女户成为主流),但事实上,就业、嫁娶、育儿、养老、医疗等诸多需求的满足仍然需要依靠亲属网络来完成,家庭成员间的生活连带责任、家庭价值、家庭规范再次受到国家的肯定和倡导,甚至通过立法(如,“常回家看看”)来促成代际观念的制度化。鉴于家庭及亲属网络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个体生活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国家对于个体忠于家庭、承担家庭义务等价值观的持续认可,城市青年的代际观念中又会非常清晰地看到家庭主义的面向。

中国个体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政策的家庭化趋势共同影响着城市青年的代际支持观念,使其既不同于强调辈分等级、父母中心的传统家庭主义,也不同于以公平交换、契约理性为基石的西方个体主义,而是呈现出既崇尚代际平等互惠又注重家庭整体福利的特点。当代青年代际观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远不是“孝道衰落”这样的线性论断所能涵盖的。

## 2. 不同代际支持行为中的观念整合

研究还通过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了城市青年在向亲代提供多维的代际支持时,在多元代际观念之间进行选择 and 组织的逻辑、特点及其产生的影响。

同住奉养观念对子代提供结构性、情感性、功能

性(含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等三个维度的代际支持存在显著的提升作用,是青年实施代际支持行为时最重要的价值类型,但是对联系性支持影响不明显。不同住奉养观念会显著降低亲子间的联系性团结。子女养老的经济奉养观念对子代提供联系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子代提供功能性支持反而不存在明显影响。老人养老的经济奉养观念对子代提供联系性支持、功能性支持(含经济支持和劳务支持)存在显著影响,但作用相反,“老人养老”的经济奉养观念会明显提升子代对亲代的功能性支持,却会降低子代的联系性支持。“权威性孝道”对子代提供结构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存在显著影响,但作用相反,“权威性孝道”会显著提升子代与亲代同住的可能性,但是会明显降低子代与亲代的情感亲密度。“相互性孝道”对子代提供情感性支持、联系性支持和经济支持等三个维度的代际支持存在显著影响,是青年实施代际支持行为时又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不过,该价值类型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相互性孝道”会显著提升子代对亲代的情感性支持,但是也会显著降低子代的联系性支持和经济支持。城市青年在提供不同维度的代际支持行为时选择和使用的代际观念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奉养观念还是孝道观念均起到了促进具体行动的现实作用。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口与家庭的双重变迁,少子老龄化、新型城市化下的人口大流动等,加快了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老龄化、家庭成员空间分离等的步伐,令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能够从家庭获取的资源不断减少、代际的生活互助越来越受到限制……家庭的脆弱性极大地增强<sup>[37]</sup>。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应倡导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代际观念体系,提升和推进全社会范围内子女对父母的照料和关心,但同时要注意区分代际观念的不同面向,加强对奉养观念的宣传、正视相互性孝道的作用、弱化权威性孝道的影响,做到有的放矢,让代际的情感性、联系性支持得以持续走强,功能性支持得以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仅仅寄希望于增强年轻子代的代际观念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国家增强对家庭的整体性支持才能让文化观念更有效地促进代际支持行动。目前我国并没有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予以家庭制度性支持<sup>[38]</sup>;有限的以家庭为对象的社会保障政策也仅仅表现为对特殊困难家庭的关注及介入,缺少对非问题家庭普遍而形式多样的直接支撑<sup>[39]</sup>,个人需求加大和公共供给不足的矛盾被转移到亲子之间。这势必会造成家庭内道义危机的扩大,给代际团结带来



很大挑战,这也是近年来“啃老”、“代间不公”、“代际剥削”等议题会被公众不断设置、热议的原因。因而,明确国家和家庭对个体的福利支持边界,协调政府、城乡以及各行动主体的资源,统筹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设计与家庭政策完善、生育政策调整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方案<sup>[40]</sup>,是家庭政策改革的“应然”方向。■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3ESH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报告建设(培育)项目(13JBG039)资金和上海师范大学(第七期)校重点学科“青年学”建设资金的资助。]

邓蕾: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年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方奕

#### 参考文献:

- [1]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M].薛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 [2] Hitlin, Steven & Jane A.Piliavin.Values: Reviving a Dormant Concept[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30).
- [3] [8] [13] Swidlers, Ann.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51).
- [4] Silverstein, M., D.Gans & F.M.Yang.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The role of norms and needs[J].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6(8).
- [5] [12] Polavieja J.G..Capturing Culture: A New Method to Estimate Exogenous Cultural Effects Using Migrant Populat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8).
- [6] 周怡.文化社会学发展之争辩:概念、关系及思考[J].社会学研究, 2004(5).
- [7] Campbell, Colin.The Myth of Social Action[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9] Vaisey, Stephen.Motivation and Justification: A Dual-Process Model of Culture in Action[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9(6).
- [10] DiMaggio, Paul.Culture and Cognition[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23).
- [11] 米歇尔·拉蒙, 劳伦·泰弗诺.比较文化社会学的再思考[M].邓红凤等,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
- [14] 王跃生.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分析——历史与现实相合的视角[J].开放时代, 2010(4).
- [15] Logan & Fuqing Bian.Family Values and Coresidence with Married Children in Urban China[J].Social Forces, 1999(4).
- [16] 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J].社会, 2009(5).
- [17] 刘汶蓉.反馈模式的延续与变迁:一项对当代家庭代际失衡的再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 [18] 邓希泉, 风笑天.城市居民孝道态度与行为的代际比较[J].中国青年研究, 2003(3).
- [19]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 [20] 周晓虹.孝悌传统与长幼尊卑: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J].浙江社会科学, 2008(5).
- [21] [33] 曹惟纯, 叶光辉.高龄化下的代际关系——台湾民众孝道信念变迁趋势分析(1994-2011)[J].社会学研究, 2014(2).
- [22] 叶光辉.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9(32).
- [23] 叶光辉.再论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的几个关键性议题[J].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9(32).
- [24] 伊庆春.台湾地区家庭代际关系的持续与改变——资源与规范的交互作用[J].社会学研究, 2014(3).
- [25] Silverstein, M.& Bengtson, V..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 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2).
- [26] 靳小怡, 崔烨, 郭秋菊.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J].人口学刊, 2015(1).
- [27] Bengtson, V.L., Gianusso, Mabry&M.Silverstein .Solidarity, Conflict and Ambivalence: Com-plementary or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2(3).
- [28] Guo, Man, Iris Chi & M.Silverstein.Family as a Context: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Competition and Family Geographic Dispersion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Elderl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11(20)(S1).
- [29] Lin, Ju-Ping & Chin-Chun Yi.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East Asia[J].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013(3).
- [30] [31] 邓蕾.“重返”文化:青年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进路探寻[J].中国青年研究, 2016(1).
- [32]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34] Davis, Deborah & Steven.Harrell(eds).Chinese Family in the Post-Mao Era[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35] 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J].社会学研究, 2015(5).
- [36] [37] [40] 彭希哲, 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中国社会科学, 2015(12).
- [38] [39] 吴小英.“去家庭化”还是“家庭化”:家庭论争背后的“政治正确”[J].河北学刊, 2016(5).